

# 唐代译场与文士：参预与影响<sup>\*</sup>

李小荣

**内容提要** 唐代是中国佛典翻译史上的黄金时代，其译场大都有文士的参预。一方面，他们或以监译、监阅等身份代表了朝廷对译场的思想控制，或对译经进行文字之润色，因此，在佛典传译及定型中具有特殊作用；另一方面，文士直接参预译事，又使他们能更全面地了解佛经文体、佛典语汇典故及佛教思想，进而影响其文学创作。

**关键词** 唐代 佛教译场 文士参预 影响

在佛教译场研究中，学术界的关注点一般在译场制度、组织形式、译经程序等方面的专题检讨<sup>①</sup>及对著名译场的个案梳理<sup>②</sup>。事实上，译场人员构成较为复杂，大致说来可分成僧、俗两类。而过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僧人，特别是那些著名的译师如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等。当然，也有少数学人如黄启江、张弓二先生注意到了世俗文士或儒臣参预这一现象<sup>③</sup>。不过，有待讨论的空间较大。兹以官方译场最盛之李唐王朝为例，对文士的译场角色、所起作用及其文学创作所受佛典之影响，分疏如下。

## 一 文士在唐代译场中的角色

本文所讲唐代文士，主要指当时中央文馆如国子监、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等文化馆所中的官员，他们大多是熟悉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朝臣，且具有较为突出的文学才能。为清眉目，在前揭张弓先生论文的基础上，结合吴夏平博士的考察<sup>④</sup>及僧传、佛藏目录等资料，先择要列一简表如下：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晋唐佛教文学史”（项目编号11BZW07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图像与文本：汉唐佛经叙事文学之传播方式研究”（项目编号NCET-11-0902）阶段性成果。又承蒙《文学遗产》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于此深致谢忱。

① 相关重要论著有曹仕邦《论中国佛教之译经方式与程序》（张曼涛主编《佛典翻译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187—282页）、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第三章《译场制度与译场组织》（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1—202页）等。

② 如〔日〕小田义久《玄奘三藏とその译场》（《竜谷大学史学杂志》1966年第56、57号合刊）等。

③ 参见黄启江《北宋的译经润文官与佛教》（《故宫学术季刊》1990年第7卷第4期）、张弓《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④ 参见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98—461页。

唐代译场文士角色简表

译主	所译佛典	译毕时间	翻译地点	文士	担任角色
波颇	宝星经	贞观四年（630）四月	大兴善寺 <sup>①</sup>	房玄龄、杜正伦	参助诠定 <sup>②</sup>
	般若灯论释	贞观六年十月十七日	胜光寺	同上	同上
				萧璟	总知监护 <sup>③</sup>
				虞世南	奉敕作序 <sup>④</sup>
	大乘庄严经论	贞观七年春	同上	房玄龄、杜正伦	参助诠定 <sup>⑤</sup>
				李百药	为经制序
				萧璟	监掌修缉 <sup>⑥</sup>
玄奘 <sup>⑦</sup>	佛地经	贞观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弘福寺翻经院 <sup>⑧</sup>	许敬宗	监阅 <sup>⑨</sup>
	大乘五蕴论	贞观二十年五月十日	同上	同上	监译 <sup>⑩</sup>
	瑜伽师地论	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同上	同上	监阅 <sup>⑪</sup>
					制序 <sup>⑫</sup>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贞观二十二年十月一日	玉华宫弘法台 <sup>⑬</sup>	杜行颢 <sup>⑭</sup>	笔受

① 此据释法琳《宝星经序》（《大正藏》，第13册，第536页下），释静泰《众经目录》卷一谓译于胜光寺（《大正藏》，第55册，第182页上），不取其说。

② 此据智昇《开元释教录》（后文简称《开元录》）卷八（《大正藏》，第55册，第553页下）。

③ [日] 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第182页。

④ 《续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441页下。但虞氏之序，今不存。

⑤ 李百药《大乘庄严经论序》谓二人角色是“铨定”（《大正藏》，第31册，第590页上），它与“参助诠定”含义相同。

⑥ 此依李百药《序》，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则把萧璟与房玄龄、杜正伦的角色都归为“监护翻译”（《大正藏》，第55册，第281页上）。

⑦ 玄奘以下诸译师译经数量皆不止表中所列，此仅举传世文献中有文士参与之代表性译经为例。

⑧ 《开元录》卷八（《大正藏》，第55册，第556页上）。

⑨ 《开元录》卷八未载是经监阅者，此据《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191页补。又，后者还载有贞观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直司书手郗玄爽、装潢手辅文开缮写装订经文之事。

⑩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189页。《大乘五蕴论》译出时间，《开元录》卷八谓“贞观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大正藏》，第55册，第556页下），未知孰是。当然，前者也可能是指翻译开始的时间。

⑪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189—190页。

⑫ 《大正藏》，第30册，第283页上—284页上。

⑬ 关于是经译出时、地说法不一，此据杨廷福《玄奘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

⑭ 据智昇《续古今译经图纪》卷一（《大正藏》，第55册，第368页下），可知杜氏能参与译场除了懂梵语外，还在于他突出的文学才能。

续表

译主	所译佛典	译毕时间	翻译地点	文士	担任角色
玄奘	十一面神咒心经	显庆元年(656)三月二十八日	大慈恩寺翻经院①	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	时为看阅,随时润色②
				范义颖、郭瑜、高若思等	助知翻译③
	成唯识论	显庆四年闰十月	玉华寺云光殿	于志宁、许敬宗等	润色④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龙朔三年(663)十月二十三日⑤	玉华寺	陈德詮	专当写经判官
				崔元誉	检校写经使
				许敬宗等	润色监阅⑥
达摩流支(即菩提流志)	佛说宝雨经	长寿二年(693)十一月三日⑦	佛授记寺	尚方监匠李审恭	装
				麟台楷书令史杜大宾	写
				麟台楷书令史徐元处	专典当并写
				文林郎傅守真	专当使
				典司宾寺府史赵思泰、司宾寺录事摄丞孙承辟	检校翻经使
	大宝积经	先天二年(713)四月八日⑧	大内佛先殿、西崇福寺等	卢粲、徐坚、苏璿、崔璵等	润文官
				魏知古、郭元振、张说等	总阅
				李式颜、徐铉等	书写⑨
				武平一	翻经使⑩

① 此译出时间、地点,据《开元录》卷八(《大正藏》,第55册,第556页上)。

② 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大正藏》,第50册,第266页下),高宗皇帝是在显庆元年正月二十七日下诏让于志宁等人参预玄奘译场,既然《十一面神咒心经》当年三月即译成,则于志宁等人自然参预了该经的译事活动。《古今译经图纪》卷四则谓于志宁等人在译场中担任“润文”(《大正藏》,第55册,第367页中),可见“润文”、“润色”其义一也。

③ 此处文字,据释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四(《大正藏》,第55册,第367页中)补。

④ 参见沈玄明《成唯识论后序》,《大正藏》,第31册,第59页下。又,序谓《成唯识论》译出时间是“显庆末”,此据《开元录》卷八。

⑤ 译出时间据《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藏》,第50册,第218页下—219页上)。

⑥ 参见《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05页。池田温所引虽是有关龙朔元年、二年《大般若经》之译场材料,但考虑许敬宗活到了咸亨三年(672),故龙朔三年是经译毕时,许氏仍应在负责监阅等事。

⑦ 参见《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38页。又,“十一月三日”,原作“九月丁亥三日己丑”,但长寿二年九月属“戊子”,“十一月”才是“丁亥”,而当月三日正属“己丑”,故更正之。

⑧ 《大正藏》,第11册,第1页中。“四月”,底本作“六月”,据校勘记改,盖四月八日佛诞节,此日功毕,更具意义。

⑨ 此名单据徐锴《大宝积经述》(《大正藏》,第11册,第1页中—2页中)。菩提流志译经始于神龙二年(706),经七年才完成,故译场参预者前后当有变化。如《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66—267页)所引神龙二年译场之文士名单是:润色徐坚、卢粲、卢藏用、苏璿、彭景直、王璿、颜温之、贺知章,监译陆象先、魏知古、薛崇胤,监护杨仲嗣,而和帝、睿宗亲为笔受,表明该经深受皇室的重视。

⑩ 《佛祖统纪》卷四〇(《大正藏》,第49册,第372页下)。

续表

译主	所译佛典	译毕时间	翻译地点	文士	担任角色
实叉难陀	大方广佛华严经	圣历二年（699） 十月八日	佛授记寺	贾膺福	监译①
				于师逸②	判官
义净	根本萨婆 多部律摄	大足元年（701） 九月二十三日	大福先寺翻经院	许观	典刘③
	金光明最 胜王经	长安三年（703） 十月四日	西明寺	同上	监护④
	一切法功德 庄严王经	神龙元年（705） 七月十五日	大福先寺	崔湜、沈务本	润文
				卢粲	润文正字
				李元敬	正字
				刘令植、杨慎交	监护⑤
	根本说一切 有部尼陀那 目得迦摄颂	景龙四年（710） 四月十五日	大荐福寺翻经院	韦巨源、苏瓌、唐休璟、韦温、 韦安石、纪处讷、萧至忠	监译
				宗楚客	同上
				李峤	笔受兼润色
				韦嗣立、赵彦昭、刘宪、岑羲、 崔湜、张说、崔日用、卢藏用、 徐坚、郭山恽、薛稷、徐彦伯、 李义、韦元旦、马怀素、李适、 苏頌、郑愔、沈佺期、武平一、 阎朝隐、符凤	翻经学士
				秘书省楷书令史赵希令	书手
				文林郎少府监掌治府丞殷庭龟	孔目官
				朝散大夫行著作左郎刘令植	判官
				金紫光禄大夫行秘书监检校 殿中监兼知内外闲廐陇右三 使上柱国嗣虢王邕	使⑥
	称赞如来 功德神咒经	景云二年（711） 闰六月二十三日	同上⑦	薛崇胤	监护⑧

① 《续古今译经图记》指出实叉难陀所译十九部经之监译都是贾膺福（参见《大正藏》，第55册，第369页下）。

② 此据敦煌写卷P.2314补，并说贾膺福角色是“使”。而“使”，当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〇所说“检校翻经使人”（《大正藏》，第50册，第277页下）的略称，也叫检校翻经使、翻经使。

③ 参见《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59页。但“典刘”含义，俟考。

④ 《开元录》卷九指出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二十部经之监护都是许观（参见《大正藏》，第55册，第568页中一下）。

⑤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66页。其中，“杨慎交”原作“杨慎文”，此据《开元录》卷九改。

⑥ 参见《大正藏》，第24册，第418页下—419页中（“岑羲”原作“岑义”，据《旧唐书》卷七〇本传改；“徐坚”原作“徐坚贞”，衍“贞”，故删；“韦元旦”原作“韦元亘”，据《新唐书》卷二〇二改；“虢”原作“号”，形近而误）。值得注意的是，表中所列宗楚客至符凤等二十四人，恰好符合唐中宗修文馆所置二十四学士（含大学士、学士、直学士）数之定额。

⑦ 《开元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567页中。

⑧ 《开元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569页上。

续表

译主	所译佛典	译毕时间	翻译地点	文士	担任角色
宝思惟	校量数珠功德经	神龙元年(705) 正月二十三日	大福先寺 <sup>①</sup>	张齐贤等	进奉
				郑喜王、韦利器、沈佺期、丘悦、李义、卢藏用、贾膺福、徐彦伯、崔湜、薛稷	详定 <sup>②</sup>
般刺蜜帝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	神龙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广州制止道场	房融	笔受 <sup>③</sup>
不空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	永泰元年(765) 四月二日	大兴善寺	杨利全	判官
				常袞、柳伉等人	同崇翻译 <sup>④</sup>
般若	大乘理趣六般若蜜多经	贞元四年(788) 十月中旬	西明寺	归崇敬、吴通微、徐岱、王丕等人	同来瞻礼
				徐承嗣、郭绍、杨绚、杨季炎等二十余人	设供观译 <sup>⑤</sup>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元和六年(811) 三月八日	醴泉寺	李霸	都勾当译经
				萧俛、归登(归崇敬)、刘伯刍、孟简	奉敕详定 <sup>⑥</sup>

就上表所列九位著名译师主持的译场而言,文士参预译事的过程较为全面,甚至译后经文的详定、缮写及入藏(如玄奘、达摩流支、义净、宝思惟译场等)之事,他们也有介入。不过,就翻译中的角色言,主要为:

一者任监译(或称监阅、总阅、监护翻译等)。出任者有的是皇帝信任的有较深佛教信仰的朝廷大臣,如萧瑀、房玄龄等,而其中又以宰相身份兼职者最为常见,竟然将近二十位<sup>⑦</sup>,他们是房玄龄、杜正伦、许敬宗、于志宁、来济、李义府、魏知古、张说、韦巨源、苏瓌、唐休璟、韦温、韦安石、纪处讷、萧至忠、宗楚客、陆象先和薛崇胤。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正如玄奘法师所说“译经虽位在僧,光价终凭朝贵”<sup>⑧</sup>,即借此可更好地体现译经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这种做法,还对北宋译场的监译(后者一般称“译经润文使”)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敦义绍兴丁丑年(1157)所作《翻译名义序》

① 此据《开元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566页下)。

② 参见《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83页,但经题作《持珠校量功德经》,而且它的进奉、详定时间在太极元年(712)四月、入藏流行则在延和元年(712)六月二十日以后。易言之,是经从译出到入藏,前后间隔七年。

③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65页。

④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五(《大正藏》,第55册,第885页上)。“柳伉”原作“柳枕”,此据《佛祖统纪》卷二二(《大正藏》,第49册,第246页上)改。

⑤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五(《大正藏》,第55册,第892页中)。

⑥ 参见《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335页(按,译经使第五从直是宦官,不录)、《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本传、卷一六三孟简本传。《佛祖统纪》卷四一则指出:“般若三藏译《本生心地经》,谏议大夫孟简润文。”(《大正藏》,第49册,第381页中)

⑦ 此数字与前引张弓先生论文所说二十二人不一,因为他把未任监译者(如崔湜、李峤等)也统计在内。又,张先生只统计了七位译师主持的译场,所以,我们说法不一自在情理之中。

⑧ 《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457页中)。

就说“我国家尝命宰辅为译经润文使”<sup>①</sup>，释志磐统计以宰辅身份出任此职者有王钦若、丁谓、章得象、文彦博、吕夷简、富弼等六人<sup>②</sup>，并且溯源至显庆元年（656）正月左仆射于志宁、吏部尚书来济奉敕“兼译经润文使”<sup>③</sup>之时。实际上，唐代并无“译经润文使”之职。但不管“监译”名称如何变化，就其本质而言，它代表的是朝廷，即中央政府运用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手段对翻译施加影响，俾使译经更好地为政治服务<sup>④</sup>。

**二者任笔受。**自有佛经汉译之后，就有笔受一职，其主要职责是记录译主（或度语）宣译的汉语译文。但在不同时期，对其语言素养、佛教哲学之要求不尽相同。而最理想的状态，是赞宁所说的“言通华梵，学综有空”<sup>⑤</sup>。表中所说的杜行颀即属此类。另据高承《事物纪原》卷七“笔受”条引《谈苑》曰：“唐世翻译有笔受官，以朝臣为之，佛陀多罗之译《圆觉经》也，房融为笔受是矣。”<sup>⑥</sup>《圆觉经》，即《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开元录》卷九谓沙门佛陀多罗译于东都白马寺<sup>⑦</sup>，但未交待笔受者。精通佛法与教史的杨亿说是房融，可能另有依据。而表中所载，房融笔受的译经是《楞严经》。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封建帝王为了表示对译经事业的重视，偶有亲自出任笔受者，如《续高僧传》卷一《僧伽婆罗传》说：“初翻经日，于寿光殿，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尽其经本。”<sup>⑧</sup>《宋高僧传》卷一《义净传》则载译《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经》时，中宗李显“御法筵，手自笔受”<sup>⑨</sup>。萧衍与李显，其实可视作有特殊政治地位的文士，因为他们也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

**三者任润文。**润文，也叫“润文官”，或称“润色”，其职能在于润色译场中笔受和缀文的录文，俾使译文表达更顺畅、语义更明晰。其起源虽早，而正式成为定制，大概始于玄奘之时<sup>⑩</sup>。从翻译史言，参与润色者多为著名文人或朝廷重臣。唐前名声最大者是谢灵运，《北山录》卷七即谓：“宋北本《涅槃经》创行南土，慧严、慧观、谢灵运以其品疏词野，依《泥洹》本共加润色。”<sup>⑪</sup>到了唐代，重臣（儒臣）或著名文士任润文官已成惯例，如表中所列玄奘、菩提流志、义净等译场。《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释家类中甚至还著录了唐人所作《润文官录》一卷<sup>⑫</sup>，可见人数不少。至于润文在学养方面的要求，赞宁说是由“通内外学者充之”<sup>⑬</sup>，即只有兼通儒释经典甚至三教经典者方可出任<sup>⑭</sup>。

**四者任正字。**正字之设，大概起于玄奘译场，最著名者是玄应<sup>⑮</sup>。他精通佛经音义，“明唐梵异语，识古今奇字”<sup>⑯</sup>，故知正字职责重在帮助笔受、缀文提高译文质量。若依现代学术之分科，他从事的是梵汉语言之比较研究，出任者多为一般的译经僧，甚或有译主兼任者，如义净译《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成唯识

① 《大正藏》，第54册，第1055页，上一中。

② 《大正藏》，第49册，第465页下。

③ 《大正藏》，第49册，第367页上。

④ 关于这点，可参见盛文辉《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操纵》（中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 赞宁著，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页。

⑥ [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⑦ 《大正藏》，第55册，第565页上。

⑧ 《大正藏》，第50册，第426页上。

⑨ 《宋高僧传》，第2页。

⑩ 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第191页。

⑪ 《大正藏》，第52册，第619页中。

⑫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册，第5184页。

⑬ 《宋高僧传》，第57页。

⑭ 如《宋高僧传》卷三载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时，润文官的特点是“儒释二家，构成全美”（第43页）。而道教方面的代表，最著名者是贺知章。

⑮ 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第192—193页。

⑯ 景审《一切经音义序》，《大正藏》，第54册，第311页下。

宝生论》等经时就兼“缀文、正字”<sup>①</sup>。世俗文士虽不多，却也偶有所见，如表中李元敬等。

文士在同一译场中的角色，有一身二任的情况：如表中卢粲是“润文、正字”，李峤是“笔受兼润色”。同一文士在不同译场，又可担任不同角色：如徐坚在菩提流志《大宝积经》译场是润文官之一，在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摄颂》译场则是翻经学士之一；张说在《大宝积经》译场是总阅之一，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摄颂》译场亦是翻经学士之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不同史料对同一文士在同一译场的角色定位也偶有相异者，如表中房融在《楞严经》译场是笔受，然赞宁又说“今观房融润文于《楞严》”<sup>②</sup>，房融到底是笔受，还是润文，抑或兼而有之，尚不能遽定。而不同史料对同一译场文士人员之多寡及其角色的记载，也常有详略之别，比如表中《大宝积经》译场是据徐锴序排列诸文士名单的，但它只记录了九位参预者的姓名（其中三次使用“等”字，显然有省略），《佛祖统纪》卷五三提供的具体名单则更少，只有武平一（翻经使）、卢藏用、张说、陆象先、贺知章（润文，两次使用“等”字）<sup>③</sup>，而且，张说的角色由“总阅”变成了“润文”。凡此种种，无疑都增加了我们研究的难度。不过，无论文士在译场中担任何种角色，甚至如般若译场仅是“同来瞻礼”、“设供观译”，参预译场（译事）都能使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佛典传译过程、佛经语言及相关佛典的思想特色，进而影响其诗文创造，特别是那些奉命撰写经序者（如虞世南、李百药、许敬宗），对所译佛典的认识自然会更全面、更透彻些。

唐代译场之文士，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思想上以儒家为主导。张弓先生称之为“五多”（应举登第多、文馆学士多、东宫官属多、修国史多、官至宰相多）儒臣<sup>④</sup>。尤其多位宰相出任监译，就是最好的说明。当然，具有强烈道教信仰的文士如卢藏用、贺知章的参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代三教并重的思想特色。而最值得一提的是参预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摄颂》译经之文士，从监译、笔受至翻经学士<sup>⑤</sup>共三十一人，近三分之一源自武后命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之时的“珠英学士”<sup>⑥</sup>，如李峤、徐彦伯、阎朝隐、徐坚、李适、崔湜、张说、沈佺期、符凤、韦元旦。作为类书的《三教珠英》，其编撰原则是“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三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部”<sup>⑦</sup>，佛、道加上传统的儒教，当是它得名依据之所在。二是文士们大多具有突出的文学才能，且不说李峤、沈佺期、贺知章、张说、孟简等都是当时著名诗人，单就进士科出身者而言就有来济、卢粲、徐坚、崔湜、苏瓌、李峤、韦嗣立、韦元旦、苏璠、魏知古、郭元振、沈务本、赵彦昭、刘宪、岑羲、崔日用、卢藏用、薛稷、李义、马怀素、苏頌、郑愔、沈佺期、阎朝隐、常袞、萧俛、刘伯刍、孟简二十八人<sup>⑧</sup>。

## 二 参预佛教译场对文士的影响

无论唐代文士参预的是佛典翻译，还是译后经文的详定、缮写及入藏，都有助于他们全面了解中

① 《大正藏》，第21册，第894页下；第31册，第81页上。

② 《宋高僧传》，第56页。

③ 《大正藏》，第49册，第465页中。

④ 张弓《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⑤ 义净译场中担任翻经学士者有二十二人之多，但他们的具体职责为何，记载译场职事分工最详细的《宋高僧传》卷三、《佛祖统纪》卷四三都语焉不详。据《续高僧传》卷二所载隋代“翻经学士涇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较数法》一卷”、“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乃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大正藏》，第50册，第436页上一中）推断，该角色似与译场之内外典比较、编撰佛经目录之类的事情有关。

⑥ 珠英学士之人数，《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谓二十六人，《郡斋读书志》卷二〇《总集类》则云四十七人，贾晋华女士则考出了其中的三十五人（《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2—483页）。

⑦ 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页。

⑧ 统计依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印文化异同，特别是佛经文体、佛典语汇典故及佛教思想之特色，进而影响其文学创作，现分述如下。

### 一者有助于唐代文士全面了解佛经文体。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显庆元年（656）开始参加过玄奘译场的郭瑜，时任太子洗马的他和国子博士范义颙、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知翻译<sup>①</sup>。据《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瑜撰有《修多罗法门》二十卷<sup>②</sup>。是书早佚，幸运的是敦煌遗书 S. 1344V 还保留了卷一开头的部分内容，题下署名云：“纪王府掾太原郭瑜<sup>③</sup>奉教撰”。纪王，即唐太宗第十子李慎，其人贞观五年（631）封申王，十年改封纪王，永徽二年（651）授荆州都督。《续高僧传》卷二〇《江州东林寺释道暄传》载永徽四年（653）正月道暄迁化后：“荆州都督纪王，夙传归戒，钦仰清晖，命右记室郭瑜铭之于彼。”<sup>④</sup>亲王府记室官阶为从六品上，府掾则为正六品上。张固也先生据此推断郭瑜撰写《修多罗法门》当在 653 年以后<sup>⑤</sup>，但何时完成，史书阙载。笔者以为，即便完成在他参预玄奘译场之前，也不能排除他利用参预译事的机会再对它进行修改与完善，毕竟译场中可供参考的佛经资料更为丰富。

从今存《修多罗法门》卷一之文字推断，郭瑜擅用中印比较法。它既体现在思想层面，如谓：

故《华严经》云：为令众生生欢喜善，故现王官生；为令众生生悲恋善，故示双林灭。故知若生若灭，无非利用。且凡夫之情，慕远而厌近，贵耳而贱目。昔者仲尼大圣，定礼乐，删《诗》《书》，使千载之下有所折中，而遂栖遑于鲁卫之郊，困厄于陈蔡之境。……道穷身殒，而令百代之后，莫不宗其道而祀其灵，子孙余庆，于今封邑，岂非贵远而贱近乎？向使至今犹存，止是一东家丘耳，谁仰之？即所以如来须生须灭，皆是涅槃之行。

此即把中土孔丘的生平事迹及儒家重祭祀的传统与西方如来的涅槃思想、示现教化进行比较。同时，也表现在文体层面，如：

偈有二种：一者通偈，二者别[偈]。通偈者，胡人数字之法，每以八字为句，四句为一偈，则一句卅二字也。此则不问长行之与短行，从首至末，皆以此法数经字也。别偈者谓四言五言七言也，亦以四句成一偈，若四言五言则一行成一偈，若七言则两行方有四句乃成一偈也<sup>⑥</sup>。……胡音曰偈，汉翻为颂，谓以短句重颂前长行也，犹如汉之碑志，每后能以韵句重颂前事也。所以能（经）中有此偈颂者，凡有三义：一者众生根有利钝，若利根者闻初说即晓，无烦后偈；若钝根者，一说不了，再颂方悟也。二者听众来有前后，后来之人不及前说，故更为之重宣偈颂也。

三者众生所好不同，或有乐长行，或有乐偈颂，或有乐广（后缺）。

于此，郭瑜首先区分了佛经的两种偈颂，即广义的通偈（也叫首卢偈，梵文 śloka）和狭义的别偈（包括伽他、祇夜，梵文分别是 gāthā、geya。最狭义偈颂，仅指祇夜，即重颂、应颂），而与中土诗歌性质相同的是别偈，尤其应颂，郭瑜谓其如汉地碑志后的韵句，正是看到了两者在内容表达上的相同之处（都用重复）。其次，他对经中偈颂的用途亦了如指掌，即不同偈颂是适应于不同的受众，易言之，重实用是佛经偈颂的根本属性之一。

① 《大正藏》，第 55 册，第 367 页中。

②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 册，第 2030 页。

③ 原卷“瑜”作琰，此据饶宗颐《文心与阿毗昙心》（《暨南学报》1989 年第 1 期）之比定。

④ 《大正藏》，第 50 册，第 600 页上。

⑤ 张固也《敦煌残卷〈修多罗法门〉作者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 年第 2 期。

⑥ 郭瑜谓别偈只有四言、五言、七言，当是从汉语齐言诗的主要形式而言，实际上汉译佛经之偈颂，三、四、五、六、七、八、九言都有。另外，他说四言、五言则一行一偈、七言两行一偈，这就涉及了当时宫廷写经的规范问题。一般而言，一纸写二十八（竖）行，每行十七字（刻本有行十九字的情况，参见钱蓉、周蓓《唐代宫廷佛经出版考略》，《江汉论坛》2010 年第 5 期）。若是七言四句偈二十八字，恰好要分成两行来写（即每行两句十四字）；四言四句十六字，一行自然能写下；五言四句二十字，从节省纸张考虑，一行也能写下。由此可知，郭瑜所说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写经规范。



虽然今存敦煌本《修多罗法门》卷一仅存有比较中印诗、偈异同的部分文字，但想来其他佛经文体如契经、授记、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和论议，郭瑜亦有充分的论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郭瑜最擅长儒家经典，如龙朔二年（662）五月他给太子李弘讲授过《春秋左氏传》<sup>①</sup>，但《修多罗法门》能统合儒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大趋势。

此外，不少参预过译场的文士还在诗作中引用过相关佛经文体及其故事。如景龙年间<sup>②</sup>担任过义净译场之翻经学士的赵彦昭《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屠应制》云：“喜闻题宝偈，受记莫由同。”<sup>③</sup>是诗作于景龙二年（708）。当年重阳节，唐中宗率群臣游慈恩寺，上官婉儿献有《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同时奉和者有李峤、刘宪、郑愔、李义、宋之问、萧至宗、李迥秀、杨谦、辛替否、王景、毕乾泰、崔日用、崔湜、李适、刘宪、卢藏用、薛稷、马怀素、岑羲等近三十人<sup>④</sup>，而半数为义净译场的参预者，或任监译（萧至宗），或任笔受兼润色（李峤），其余悉为翻经学士（详见前列表格）。赵诗“宝偈”之“偈”，本是佛经文体，此借喻中宗皇帝原诗（已佚）；“受记”，即“授记”（梵语 vyākaraṇa），一般指佛预言弟子未来世证果类的经典，此旨在赞颂中宗皇位的正统性。统合而言，两句诗的意思是：中宗之诗如佛经之法偈，而李显皇位也如佛做出的授记一样，是不可改变的<sup>⑤</sup>。

再如，景龙年间与赵彦昭同时加入义净译场、同任翻经学士的苏颋则有诗曰《慈恩寺二月半寓言》：

二月韶春半，三空霁景初。献来应有受，灭尽竟无余。化迹传官寺，归诚谒梵居。殿堂花覆席，观阁柳垂疏。共命枝间鸟，长生水上鱼。问津窥彼岸，迷路得真车。……不驻秦京陌，还题蜀郡舆。爱离方自此，回望独踟蹰。<sup>⑥</sup>

是诗作于开元九年（721）二月下旬苏颋第一次离京入蜀时<sup>⑦</sup>。慈恩寺，即玄奘译场所在地之一，它既是唐代的官方大寺，又是当时的游览胜地。“二月半”，即二月十五日，这是佛教重要节日之一，即佛涅槃日，也称佛忌，并要求“凡在伽蓝，必修供设礼”<sup>⑧</sup>。“献来”云云，当是描绘慈恩寺之设供放生等佛事场景，但诗人生发的却是对五苦之一——爱离苦（即爱别离苦）<sup>⑨</sup>的感慨。不过，我们更关注诗中所用佛典的出处，有的就出于义净译经：如共命鸟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一五所载“共命鸟本生”<sup>⑩</sup>，其为佛本生故事；长生鱼则见于《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长者子流水品》<sup>⑪</sup>，亦佛

① 王钦若等编撰，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2956页。

② 若按《开元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568页下—569页上），赵彦昭神龙二年（706）至景龙四年（710）一直是义净译场“次文润色”之一。

③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〇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254页上。

④ 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

⑤ 武则天天授二年（691）三月《释教在道教之上制》曰“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7页），赵彦昭之诗，当是对前者的化用。不过，李显一出生就获得了佛光王的赐号，此举似可视为唐高宗对中宗的授记，即后者已是护法王，将来成为世王亦合天意。

⑥ 《全唐诗》卷七四，上册，第193页下。

⑦ 吴明贤《苏颋入蜀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⑧ 《佛祖统纪》卷三三（《大正藏》，第49册，第319页中）。

⑨ 北周释亡名《五苦诗·爱离》曰：“谁忍心中爱，分为别后思。几时相握手，呜噎不能辞。虽言万里隔，犹有望还期。如何九泉下，更无相见时。”（《大正藏》，第52册，第358页下）而苏颋之作，无论思想情感还是写作方法，都与前者颇多相似处。

⑩ 《大正藏》，第24册，第69页下—70页上。

⑪ 《大正藏》，第16册，第448页下—450页下。

本生故事<sup>①</sup>。可见，参预译场确实使苏颋对相关佛典文体及其故事印象深刻，甚至十几年过去了，使用时依然可信手拈来。当然，两则本生故事所蕴含的义理与苏颋当时的心境也相当契合，因为共命鸟比喻的是命运共同体，长生鱼歌颂的是佛陀的慈悲情怀与无私奉献，这其实暗示了苏颋第一次入蜀之因。开元八年（720）正月，他与好友宋璟一道因为建议严禁恶钱而被罢知政事，不久自己又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易言之，“共命鸟”一句实喻他和宋璟同受牵连之事，“长生鱼”一句则喻指两人行事出于公心。然而正是这种无私奉献导致了两位挚友的分道扬镳，故诗人才有“迷路”之叹。

## 二者有助于唐代文士更准确使用佛典语汇与典故。

前列表格中参预译场的唐代文士，只要有诗文传世者，绝大多数人都写过释家题材，而他们对佛典语汇与典故的运用，相对说来更准确，更生动，更富理趣。于此，仅举四例略作简要说明。

1. 萧至忠《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曰：“登高凌宝塔，极目遍王城。”<sup>②</sup>诗中“宝塔”，即慈恩寺塔；而“王城”是双关，它借用玄奘译《大般若经》卷五〇一所说“吉祥茅国”来比喻眼下的京城长安。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吉祥茅国”条释曰：

古名王舍城，即摩揭陀国之正中心，古先君王之所都处。……卉木繁荣，羯尼迦树盈满其中，春阳花发，烂然金色。迦兰陀竹园在山城门北，俯临其侧，耆闍崛山在此山城之内王城外也。<sup>③</sup>

可见“王城”即“王舍城”之略称，其地环境优美。作为佛光王的李显，复登帝位后对幼时老师玄奘法师怀有深厚的感恩之情<sup>④</sup>，而景云二年陪同游幸慈恩寺的萧至忠在诗中用上玄奘倾尽心力才译出的六百卷《大般若经》之典故，也算是费尽心思了。

2. 刘宪《奉和幸大荐福寺应制》则曰：“甚欢延故吏，大觉拯生人。”<sup>⑤</sup>大荐福寺由唐中宗旧宅改造而成，是义净法师的主要译场。该诗作于景龙二年十二月六日，同题奉和者有李峤、赵彦昭、郑愔、李义等<sup>⑥</sup>。刘诗第二句之“大觉”，本指世尊的觉悟，也作正觉、大悟。盖佛陀觉悟之后，又使他人得到解脱，终至觉行圆满，是自利利他的完美结合。故译经常以之指代大乘诸佛，唐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卷二即云“是为道场地，大觉所端居。过去及未来，一切诸佛座”<sup>⑦</sup>，诗中则用来比喻中宗，旨在赞颂他是人世间的大法王，是群生的救度者，倒也契合李显“佛光王”之号了。

3. 张说《奉和同皇太子过慈恩寺应制二首》（其二）曰：“圣君成愿果，太子拂天衣。”<sup>⑧</sup>是诗作于景云二年（711），同为翻经学士的沈佺期有同题之作<sup>⑨</sup>。圣君指唐睿宗李旦，太子指李隆基。尤可注意的是后一句，它用了著名的佛经譬喻。如后秦竺佛念译《菩萨瓔珞本业经》卷二《佛母品》云：

一切菩萨行道劫数久近者，譬如一里、二里乃至十里石，方广亦然，以天衣重三铢，人中日

① “共命鸟”又见于北魏吉迦夜、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三（《大正藏》，第4册，第464页上），“长生鱼”复见于北凉昙无讖译《金光明经》卷四《流水长者子品》（《大正藏》，第16册，第352页中—353页下）。苏颋既然是义净译场的翻经学士，则他对义净此前所译经典当有所通览（《金光明最胜王经》长安三年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的译出时间不详，若据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三，它与《破僧事》等七部律典译于证圣元年至景云二年间，且《药事》排在七者之首，应属最早出），故得知相关本生故事时，似无必要舍近求远而去读唐前译经。

② 《全唐诗》卷一〇四，上册，第255页上。

③ 《大正藏》，第54册，第342页中。

④ 关于唐中宗与玄奘的佛教因缘，参见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2页。

⑤ 《全唐诗》卷七一，上册，第187页下。

⑥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第51页。

⑦ 《大正藏》，第11册，第9页中一下。

⑧ 《全唐诗》卷八七，上册，第223页中。

⑨ 沈佺期、宋之问著，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4页。

月岁数，三年一拂，此石乃尽，名一小劫。……又八十里石，方广亦然，以梵天衣重三铢，即梵天中百宝光明珠为日月岁数，三年一拂，此石乃尽，名为中劫。又八百里石，方广亦然，以净居天衣重三铢，即净居天千宝光明镜为日月岁数，三年一拂，此石乃尽，故名一大阿僧祇劫。<sup>①</sup>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五则云：

“劫”义，佛譬喻说：“四千里石山，有长寿人百岁过，持细软衣一来拂拭，令是大石山尽，劫故未尽。……”菩萨如是无量劫，发大正愿度脱众生。<sup>②</sup>

细软衣即天衣，拂天衣本来比喻时间长久。而张说活用佛典，意把太子李隆基比作发愿度脱众生的大菩萨，称颂他永远都是救世主。

4. 苏颋《武担山寺》曰：“武担独苍然，坟山下玉泉。鳌灵时共尽，龙女事同迁。松柏含哀处，幡花种福田。诩知留镜石，长与法轮圆。”<sup>③</sup>是诗作于颋开元十一年（723）夏至次年秋冬第二次入蜀时<sup>④</sup>。据《华阳国志》云：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作《史邪歌》、《龙归之曲》。<sup>⑤</sup>

可见寺之原址为蜀王妃冢。而王妃本是山精所化，苏诗却把她说成龙女，表面看，是受蜀王《龙归之曲》或相关传说的影响而来。若从全诗关键词是佛典语汇如幡花、福田、法轮而言，则龙女之说采自佛经的可能性更大。如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一就载有龙女（亦叫龙妇）化作人形向佛求救，恳请他禁止诸比丘在俭岁之时割食其夫之肉，佛便以慈悲之心而制订相关戒律<sup>⑥</sup>之事。故事所述龙女对丈夫的深切关怀之情，与蜀王爱恋其妃的真挚情感相比，倒有相同之处。苏颋既然参加过义净译场，对此故事当不会陌生，写诗时产生相似联想也在所难免吧。

三者有助于唐代文士更好地表达佛教思想。

唐代文士大多对佛教思想有所了解，但参预译场者的理解一般更为全面深入，特别在他们遭遇人生波折时，兹举三人为例。

#### 1. 沈佺期

诗人神龙年间曾被流放驩州，期间有多篇诗文表露了他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与理解。如“欲究因缘理，聊宽放弃惭”（《九真山净居寺谒无碍上人》）、“吾从释迦久，无上师涅槃。探道三十载，得道天南端。……处俗勤宴坐，居贫业行坛。试将有漏躯，聊作无生观。了然究诸品，弥觉静者安”（《绍隆寺》）、“稽首医王，誓心无常，向何业而辞国？今何缘而赴乡？岂过往而追受，将来愆而预殃，即抚躬以内究，幸无慙以自伤。心悟辱而知忍，迹系穷而辨方”（《峡山寺赋》）<sup>⑦</sup>。虽说诗人早在三十年前刚中进士时（上元二年即675年左右，约二十岁）就归依了佛教，但真正理解其精髓却在放逐驩州之时。据前列表格，神龙元月正月二十三日他还担任宝思惟译场的详定，因在神龙政变中受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之牵连，故在十来天后的二月乙卯（农历初五）被流放<sup>⑧</sup>。流放之后，反思自己所作所为时，

① 《大正藏》，第24册，第1019页上。

② 《大正藏》，第25册，第100页下。

③ 《全唐诗》卷七三，上册，第191页中一下。

④ 吴明贤《苏颋入蜀考》。

⑤ 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88—189页。

⑥ 《大正藏》，第24册，第5页上一中。

⑦ 《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第93—94、125、264—265页。

⑧ 《旧唐书》、《新唐书》沈佺期本传皆未详载沈氏被流放的日期，但《资治通鉴》卷二〇八载神龙元年二月乙卯，当时因二张事件被贬的有韦承庆、房融等，故疑沈于同时遭放逐。

此前接触的各种佛教思想便成了理论指南，如因缘学说、无生学说等，甚至也按佛教徒的修行方式，打起了坐（宴坐），行起了坛忏（行坛），在得到遇赦消息而将北归（“今何缘而赴乡”）时，也能躬身自省，以业报观来解释所有遭际，提倡以忍辱（大乘六度之一）观面对未来。

## 2. 房融

房融亦因二张事件被贬，贬途中作有《谪南海过始兴广胜寺果上人房》，诗曰：“零落嗟残命，萧条托胜因。方烧三界火，遽洗六情尘。隔岭天花发，凌空月殿新。谁令乡国梦，终此学分身。”<sup>①</sup>“三界火”即著名“法华七喻”之一的“火宅喻”，用来比喻充满无穷烦恼的众生世间。什译本卷二《譬喻品》即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然不息。”<sup>②</sup>房融正是有感于此，故最后表达了“学分身”（分身，本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时的化身，即分身摄化。此指代佛）的强烈愿望。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评论该诗时说：“融之文章见《楞严经》，诗止此一篇。李峤、沈、宋之流方为律诗，谓之近体，此诗近体之祖也。”<sup>③</sup>明末清初钱谦益《楞严经疏解蒙钞》卷一〇除赞同朱氏观点外，并有按语云：“房公以宰相长流，诗句萧然，都无凄婉之致，岂非笔受《首楞》之后，超然有待以自得者耶？”<sup>④</sup>牧斋言下之意是：房融参预《楞严经》译场，对其诗风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3. 张说

据前列表格，张说曾在神龙至先天年间先后在菩提流志、义净译场中分别担任总阅和翻经学士。其人一生虽三任宰执，却也受过两次贬谪：一是长安三年（703）九月流放钦州，至神龙元年才被召回，出任兵部员外郎；二是开元元年（713）十二月至开元六年（718），先后在相州、岳州、荆州等地任职。特别是第二次被贬期间，写有多篇释家类题材的诗歌，从中可见佛教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如“楚老游山寺，提携观画壁。扬袂指辟支，睨眄相斗阋。险哉透撞儿，千金赌一掷。成败身自受，傍人那叹息”（《澧湖山寺》）<sup>⑤</sup>描绘了游赏佛寺壁画的感觉，最后两句，似包含了他对自己与姚崇、宋璟相争而被贬之事的反思，表现出对佛教自作自受报应观的高度认同。《游龙山静胜寺》又说：“每上襄阳楼，遥望龙山树。……世上人何在，时闻心不住。但传无尽灯，可使有情悟。”<sup>⑥</sup>此则化用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上《菩萨品》之经文：

维摩诘言：诸姊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如是诸姊！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sup>⑦</sup>

意在说明诗人对佛法无尽教益的尊崇，表明他在自悟后有觉悟群生的大乘誓愿。

综上所述，参预译场的唐代文士，无论其主流思想是儒是佛甚或道，都不免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受过汉译佛典的影响。而过往研究佛教影响中土文学创作者，对译场的关注，总体说来还很不够，因此，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作者简介〕李小荣，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等。

（责任编辑 刘京臣）

① 《全唐诗》卷一〇〇，上册，第251页下。

② 《大正藏》，第9册，第14页下。

③ 《丛书集成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1册，第316页下。

④ 《大藏新纂卍续藏经》，河北省佛教协会2006年版，第13册，第861页中。

⑤ 《全唐诗》卷八六，上册，第221页上。

⑥ 《全唐诗》卷八六，上册，第221页中一下。

⑦ 《大正藏》，第14册，第543页中。